

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研究*

张传宇

内容提要 在沦陷时期的广州,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线,日本居留民群体的发展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日本居留民人口迅速增长,并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表现出经济活动“繁荣”和主要团体“复苏”的景象。但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在人口规模不断萎缩的同时,其经济活动和主要团体的发展都受到占领当局政策的严重干预,而随着其“统制化”色彩不断加深,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也就无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败。

关键词 日本居留民 广东日本居留民会 广东日本居留民团 统制

在抗日战争期间,广州自1938年10月被日军占领后,开始了长达6年又10个月的日伪统治时代。日军的占领行为深刻地改变了广州社会发展历程,给当地居民带来了巨大的人身及财产损失。目前对于中方的受害情况研究虽已积累了不少成果^①,但对于加害方的研究,仍局限于台湾拓殖株式会社等日本国策会社的活动^②,难以据此窥其全豹。因此,本文试图在分析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的人口波动与职业分布基础上,对“广东日本居留民会(团)”的组织与活动进行讨论,并以此对该时期日本居留民在广州的活动情况做初步考察。

一、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人口的波动情况

早在清末,19世纪80年代日本居留民已开始在广州活动。此后经过数十年的发展,至抗战爆

* 本文系广东省社科“十二五”规划2013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广州沦陷时期日本主导下的统制贸易研究”(GD13XLS05)阶段性成果。

本文曾参加由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等单位联合举办的“第一届抗日战争史青年学者研讨会”,承朱荫贵教授、徐志民博士、孙扬博士提出宝贵意见,特此致谢。

① 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马永:《日伪统治时期的广州经济》,硕士学位论文,广州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2007年;张遂新:《日伪统治时期广州的人口迁移》,《广州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② 朱德兰:《日据广州时期(1938—1945)的广州社会与台拓国策公司的自来水事业》,《家庭、社区、大众心态变迁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黄山书社1999年版;朱德兰:《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在广东的经济活动——以农产事业为例(1939—1943)》,《台湾与中国大陆关系史讨论会论文集》,台北,“国史馆”2001年版;朱德兰:《从台拓档案看日据广东时期的中日合办事业》,叶显恩编:《中国传统社会经济与现代化》,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王健:《抗战时期台湾拓殖株式会社对广东、海南的经济侵略》,《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2期。

发前夕形成了拥有 500 余人口和大批专属设施的居留民群体,聚居于沙面租界。^①

抗战爆发后,广州的日本居留民在 1937 年 8 月 16 日受命离穗,随即于 8 月 18 日前全体撤至香港,其中大部分又从香港转往日本内地或台湾。在这些人中,有不少人热切期待着能够乘战争之机重返广州。比如曾在抗战前担任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下文简称“商工会议所”)副会头的冈本矶太郎曾回忆道,他返回日本后一直静观战局的发展,在得知日军占领广州的消息时,不禁拍着手跳了起来。^②

1938 年 11 月 12 日,日本平民获得了自由前往广州的许可。很快,11 月 15 日,从台湾的高雄向沦陷中的广州发出了第一班船,并于 11 月 18 日到达。^③ 日本居留民时隔 1 年又 3 个月后再一次出现在广州。此后当地日本居留民的人口增长很快,据说在 1938 年底已经超过千人^④,1939 年日本内地人人口达 4000 人以上^⑤,与战前相比呈现出惊人的增幅。

1940 年 1 月至 1944 年 7 月广州日本居留民的数量如表 1 所示。虽然在 1940 年 5 月,为防止日元泛滥、贬值和取缔不良日本人,日本政府曾下令限制日本人前往在华占领地^⑥,但是表 1 中的数据则说明,在上述法令出台后广州日本居留民的人口依然保持了增长势头。

表 1 1940 年 1 月—1944 年 7 月广州日本居留民人口^⑧

单位:人

时间	地域	日本内地人	朝鲜籍人	台湾籍人	合计
1940 年 1 月	广东省全体	6103	407	3642	10152
	广州	5950	347	3598	9895
	沙面	100	—	3	103
1941 年 1 月	* 广东省全体	8482	632	3614	12729 ^⑨
	广州	7327	380	3498	11205
	沙面	176	1	11	188
1941 年 4 月	广东省全体	9256	759	4004	14019
	广州市内	7933	380	3510	11823
	沙面	193	1	10	204

① 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119、121—123、125 页。

② 近代时期日本官民习惯上称广州为“广东”,当指行省时则称“广东省”。因此如“广东日本居留民会”“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等,实际上都是广州本地日本居留民团体。

③ 南支派遣軍報道部編『兵隊』第 9 号、1939 年 10 月、刀水書房、2004 年復刻版、27—28 頁。

④ 内藤英雄『広東戦後報告 附 香港を脱く』、バブリ社、1939 年、8—9 頁、12 頁。

⑤ 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広東日本商工會議所、1943 年、297 頁。

⑥ 外務省通商局編『海外各地に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不二出版、1939 年初版、2002 年復刻版。此时广东省的日本内地人几乎全部集中在广州。(附表 2《1926—1929 年、1935—1936 年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日本人职业分布表》注释 2,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127 页)

⑦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C04122075500(第 2 画像目から第 7 画像目まで)、昭和 15 年「陸支密大日記第 17 号 2/3」(防衛省防衛研究所)。

⑧ 资料原文中的“广东省全体”指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区内合计人数。在资料原文当中,依据统计时间的不同,在指“广州”时有“广东”及“广州”两种指称方式。为便于阅览,在制作上表时将用语统一为“广州”。在资料原文当中,1940 年 1 月 1 日与 1941 年 1 月 1 日的条目里没有“广州市内”的统计项目。因此按照资料原文,将以上时期中的市内人口区分为“广州”与“沙面”。而据资料原文的上下文推测,此处的“广州”应包含了“广州市内”与广州的“河南”地区。

⑨ 按该表统计数字合计应为 12728 人,但原档案数据如此。

续表 1

时间	地域	日本内地人	朝鲜籍人	台湾籍人	合计
1941年7月	广东省全体	9640	783	4194	14617
	广州市内	8214	396	3663	12273
	沙面	217	—	10	227
1941年10月	广东省全体	10307	917	4584	15808
	广州市内	8746	532	4071	13349
	沙面	316	—	9	325
1942年1月	广东省全体	10222	943	4546	15711
	广州市内	8775	560	4060	13395
	沙面	319	—	9	328
1942年7月	广东省全体	9430	557	4663	14650
	广州市内	8495	386	4333	13214
	沙面	273	—	1	274
1942年10月	广东省全体	9184	446	4554	14184
	广州市内	8191	290	4232	12713
	沙面	340	—	6	346
1943年1月	广东省全体	9027	447	4274	13748
	广州市内	8004	286	3991	12281
	沙面	367	—	—	367
1943年4月	广东省全体	8881	483	4422	13786
	广州市内	7790	296	4133	12219
	沙面	410	—	—	410
1943年7月	广东省全体	8053	480	4369	12902
	广州市内	6970	312	4043	11325
	沙面	450	—	15	465
1943年10月	广东省全体	7330	567	3954	11851
	广州市内	6153	400	3639	10192
	沙面	533	—	11	544
1944年1月	广东省全体	7082	564	3892	11538
	广州市内	5873	402	3532	9807
	沙面	570	—	19	589
1944年4月	广东省全体	6953	562	3889	11404
	广州市内	5777	393	3511	9681
	沙面	553	—	22	575
1944年7月	广东省全体	6907	529	3868	11304
	广州市内	5591	353	3465	9409
	沙面	548	—	22	570

资料来源：由下述资料相应年份数据制成：「中華民國在留本邦人及第三國人人數概計表」、外務省政務局[ほか編]「戰前期中國在留日本人統計」第8卷、不二出版、2004年復刻版。

依据表 1,对于 1940—1944 年广州日本居留民的人口波动、分布和出生地问题可以获知如下情况。

首先,广州市内日本居留民数量的增长态势大致持续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为止,在 1942 年 1 月达到 13395 人的峰值,是战前人口峰值的 20 余倍。其后则转而递减,大约每 3 个月减少数十人乃至数百人不等。到 1944 年 7 月,包含沙面租界在内的广州日本居留民人口已不足 1 万人,再次跌落到 1940 年 1 月的水平。这种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顶点的抛物线式人口波动极具特殊性,因为在上海以及华北沦陷区的主要城市当中,日本居留民的人口在 1942 年后仍然持续增长。^① 虽然广州成为特例的确切背景尚不明确,但部分广州日本居留民迁往新近沦陷的香港有可能是造成人口增长趋势出现转折的直接原因,而太平洋战争中珠三角占领地物资供给的匮乏,则可能是当地日本居留民人口持续减少的深层因素。

其次,如从分布地域看,日本居留民集中在广州市内而非沙面租界。这说明广州沦陷后日本居留民的居住和活动范围重新扩展到沙面租界外的中国人街区。

最后,如分析日本居留民的出生地,可知日本内地人虽然仍占日本居留民总人口的半数以上,但台湾籍人口则延续了从 20 世纪 30 年代起逐渐增长的趋势^②,此时常占到日本内地人人口的半数到三分之二。而朝鲜籍人只有数百人。如从人口变化幅度看,日本内地人人口的波动最为剧烈,而相比之下台湾籍人人数却较为稳定。到 1944 年 7 月份,广州日本居留民中的日、台、朝籍人比例再次回到与 1940 年 1 月大致相当的水平。

二、沦陷时期广州日本居留民的职业构成

日军占领广州以后,通过军管、委任经营、中日合办、租赁、收买等多种方式控制了广州的近代工业。^③ 与此同时,由于广州的中国资本家、工厂主等富豪阶层在广州沦陷前夕已全部逃离,此后也几乎无人返回复业,所以依靠广州旧有的工商业力量来稳定当地经济比较困难。^④ 这种局面客观上为日本居留民在工商业领域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表 2 可以了解 1939—1940 年广州日本居留民的主要职业构成情况。

表 2 1939—1940 年广州日本居留民的职业构成

单位:人

名次	1939 年		1940 年	
	行业	从业者人数	行业	从业者人数
1	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店员、业务员	1277	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店员、业务员	2311
2	艺妓、娼妓、酌妇及其他	549	艺妓、娼妓、酌妇及其他	703

① 陈祖恩:《上海日侨社会生活史(1868—1945)》,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531—533 页;米卫娜:《近代华北日侨问题研究(1871—1946)》,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7 页。

② 附表 1《1907—1940 年日本驻广东领事馆管区内日籍人口统计表》,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 5 期,第 125 页。

③ 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第 132 页。

④ 作間喬宣(南支派遣軍報道部長、陸軍歩兵中佐)「再建広東の現勢」、台湾總督府内台湾時報發行所『台湾時報』1940 年 8 月号、7 頁。

续表 2

名次	1939年		1940年	
	行业	从业者人数	行业	从业者人数
3	旅店、料理店、妓院及艺妓业、游乐场、剧场	181	国家及地方官吏	283
4	物品贩卖业	157	物品贩卖业	123
5	国家及地方官吏	107	旅店、料理店、妓院及艺妓业、游乐场、剧场	101
6	木匠、泥瓦匠、石匠、油漆匠	97	车马业、汽车司机	84
7	贸易商(不含店员与公司职员)	78	佣人	82
8	船舶业者	78	贸易商(不含店员与公司职员)	77
9	工厂工人	78	船舶业者	61
10	医疗相关行业	74	木匠、泥瓦匠、石匠、油漆匠	47

资料来源:根据外務省通商局編「海外各地在留本邦人職業別人口表」中1939—1940年有关数据制成。

以上数据体现出日军占领广州初期当地日本居留民职业构成的动态变化。在1939—1940年,“公司职员、银行职员、商店店员、业务员”群体一直是广州日本居留民的主干。这虽然与从20世纪20年代到抗战爆发前的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显现出相似的商业移民倾向^①,但由于此时的“发展”是以武力占领为依托,因此该群体一方面协助占领当局控制了广州的经济命脉,另一方面又易于受到占领当局政策的裹挟以及日本战局的影响。第二个比较多的,是于其他日本在华占领地同样多见的“艺妓、娼妓、酌妇”等日本女性^②,该群体在抗战前的广州日本居留民当中人数并不多^③,而此时却因战争关系剧增。与上述女性群体密切相关的是“旅店、料理店、妓院及艺妓业、游乐场、剧场”等行业,由日资经营的上述事业被统称为“特种营业店”。^④在沦陷时期的粤港澳地区,“特种营业店”绝大部分集中在广州,艺妓或酌妇们在上述行业及慰安所之间不断进行转业。^⑤值得注意的是,1940年“特种营业店”经营者数量较1939年大幅减少,而与此同时艺妓、娼妓和酌妇数量却继续增加,这凸显出在该行业内部激烈竞争的同时,日籍从业者却因逐渐从依附日军转变为依附日本居留民群体而呈现畸形繁荣。^⑥此外,在1940年日籍“国家及地方官吏”的人数较1939年增长1倍有余,这应是反映出1940年5月10日汪伪广东省政府及广州市政府成立后,日籍联络官大量进入伪政府的有关情况。^⑦而1940年日籍“车马业、汽车司机”及“佣人”群体形成一定规模的

① 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24页。

② 日本人在华卖淫业的据点最初为上海,当地艺妓也从事卖淫活动。后迫于国际废娼运动的压力,上海的日本总领事馆于1931年指示将低级艺妓的称谓改做“酌妇”,即陪酒女,并将妓院改称“沙龙”。(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178—179页)据此,沦陷时期广州日籍艺妓、酌妇应皆为娼妓。

③ 附表2《1926—1929年、1935—1936年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管内日本人职业分布表》,张传宇:《抗日战争前的广州日本人群体——以人口及职业问题为中心》,《中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5期,第125—127页。

④ 沦陷期间广州日资妓院、酒家、咖啡馆、旅馆、慰安所等都属于“特种营业店”。(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第340—341页)

⑤ 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第243—244页。

⑥ 据曾沦为日军慰安妇的台湾女性回忆,在日军对广州的占领逐渐稳固后,部分日军调防他处,造成慰安所客源减少,某些台湾籍慰安所经营者因而转营日式酒家,其掌控下的台湾女性也随之转业。当时慰安所专门为日军开设,而上述日式酒家则以接待高收入的日本军官及一般商民为主。此类日式酒家中的台湾女性除陪酒外仍旧卖淫,但并非强制性性质。(朱德兰:《台湾慰安妇》,第341页)

⑦ 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第128页。

现象,则应是日本商业移民以及日籍官吏群体人数增长的副产品。另一方面,在1939年曾作为广州日本居留民重要行业的“工厂工人”和“医疗相关行业”从业者到1940年已经退出主流。工人人数的减少也许是由于经过1938—1939年的战争和掠夺,进入1940年之后广州的工厂设备或已维修完毕成为日本军用或民用器材,或已完成拆卸运至日本。^①而医护人员的减少则对应着1939年之后日军对广州占领态势的逐渐巩固。

表2是日本外务省针对各主要行业从业人数进行的统计,而表3则是由商工会议所在1941年8月对广州市内日本企业数量进行的调查。值得注意的是,归属于“特种营业店”的“料理店、饮食店”位居榜首,如将“宾馆、旅店、借宿业”算入则此类企业数量更多。而贸易业虽然从业人数最多,但企业数量却只位居第二。其他企业广泛分布在各种手工及零售行业。

表3 1941年8月广州日本企业的行业分布情况

单位:家

行业	数量
料理店、饮食店	112
贸易业	105
食品、罐头	28
照相馆、照相材料、留声机唱片	28
点心制造及贩卖	27
土木建筑承包、家具制造贩卖业	25
布匹、饰品、首饰、制作西装	24
运输、装卸、仓库	21
精肉、鲜鱼、水果、蔬菜	18
药品、化妆品商	18
汽车、自行车贩卖及修理,零部件、汽油贩卖	17
钟表、眼镜、贵金属商	14
书籍文具、印刷	14
宾馆、旅店、借宿业	14
烟草	13
电气、机械、器具贩卖及工程承包业	13
剧场、曲艺场	12
酿造、清凉饮料、豆腐制造	11
汽车出租业	9
海产物、渔业	8
矿业、五金业	6
铁匠	6
制纸及贩卖	5
百货商店	5
皮革业	3
银行	3
木料	3
商铺租赁业	2

^① 黄菊艳:《抗战时期广东经济损失研究》,第132—136页。

续表3

行业	数量
制冰及贩卖业	2
保险业	2
火柴制造及贩卖业	1
水泥制造及贩卖业	1
其他	77
合计	647

资料来源:菊江荣一「新生の広東経済」、同盟通信社、1942年、65頁。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战况的持续恶化导致其航运能力不足,且对广州的物资供应锐减。到1943年12月,广州各行业当中日本企业的自主性被剥夺,变为单纯的物资配给单位。^① 进入1944年后,日本向广州进行物资供应越发困难,使一直靠垄断日本进口物资获利的日本商人陷入穷境,难以自立。在此情况下,广州的日本占领当局着手整顿当地日本企业,而由此产生出的富余人口却因无力安排航船送回日本,只得设法在当地消化。为此,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在1944年3月1日发布“劳务调整令”,在广州的工业、矿业、交通业、商业领域中各指定一部分重要产业,同时设立为日本居留民服务的就业指导机构“广东战时经济相谈所”,尽力将这批人集中在重要产业部门工作。上述政策对于广州日本居留民的职业构成产生了巨大冲击。比如,钟表业此后开始兼营军需品,点心业者减少了三分之一,而饮食业者及零售业者则全被动员至指定的重要产业部门中。15岁到30岁的未婚日本女性也成为动员的对象,在1944年10月之前有约50人被送入指定的重要产业部门劳动。^②

三、沦陷时期的广东日本居留民会与广东日本居留民团

1921年在日本驻广东总领事馆的指令下,广州日本居留民曾成立了广东日本居留民会(下文简称“居留民会”),是当地日本人小学校及墓地的负责团体。^③ 在抗战爆发初期,因日本居留民撤离广州,居留民会也一度终止活动,但随着广州沦陷后日本居留民再度聚集而得到恢复。^④

由于此时广州日本居留民人口激增,居留民会于1940年4月1日升格为广东日本居留民团(下文简称“居留民团”),与此同时对原有机构进行了调整。调整后的居留民团设立居留民团民会(下文简称“民团民会”)作为决议机构,从团员中选出27人充当“民团民会议员”,并以其中7名议

① JACAR(アジア歴史資料センター)Ref. A06032525900(第91画像目)、南支南洋時報(国立公文書館)。

② 《广州日侨加紧转向重要产业部门工作》,广州《建设月报》第1卷第1期,1944年10月,第143页。此时广东日本居留民社会经历的企业重组实际上深受日本国内产业统制政策的影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海上运力损失严重,因此日本战时增强生产委员会于1943年指定钢铁、煤、轻金属、船舶、飞机为5大重点产业。同时为将资源集中在重点产业,1943年6月日本制定《整顿企业、加强军事力量基本纲要》,对中小企业进行整顿,而食品行业及纤维产业为此次中小企业整顿的重点行业。(雷鸣:《日本战时统制经济研究》,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70、139页)

③ 中村孝志「広東日本人小学校——その成立と終焉——」、『天理大学学報(学術研究会誌)』第159輯、天理大学学術研究会、1988年9月、2頁、5頁。

④ 平野健編「広東之現状」、広東日本商工会議所、1943年、76頁,具体重设时间不明。此外,抗战前的广东日本居留民会设立于1921年。(中村孝志「広東日本人小学校——その成立と終焉——」、『天理大学学報(学術研究会誌)』第159輯、1988年9月、5頁)

员组成参事会,作为民团民会决议的执行机构。^① 参事会在民团民会先行讨论的基础上,主持推进居留民团中的神社、学务、卫生、法规、课金调查、课金异议审查、福利增进等各方面事业。^② 由于居留民团本身未设团长一职,因而参事会长实际上成为居留民团的负责人。此外还聘有理事1名、主事1名、书记4名、见习书记5名来处理民团具体事务。^③ 此时民团民会议员及参事会员的情况如下(表4)。

表4 广东日本居留民团民会议员(1940年6月1日)

职位	姓名	所属
参事会长	冈本矶太郎	协同组/德和洋行
参事会副会长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参事会员	金田武治	
参事会员	大岛国辰	
参事会员	唐泽信夫	南支日报社
参事会员	森广三郎	三井物产
参事会员	关泽明	
议长	长谷川武吉	日本邮船
副议长	高木秀雄	
议员	井上正男	
议员	今道勇吉	
议员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
议员	富野辰一	广东内河运营组合
议员	陈旺枳	福民堂
议员	加藤德十	
议员	河村文太郎	河村洋行
议员	叶猫猫	
议员	罗阿进	广福公司
议员	山崎三郎	
议员	小出三郎	
议员	古贺乙作	
议员	神津幸右卫门	
议员	浅野贤智	浅野水泥
议员	篠田有策	南洋仓库
议员	岛义雄	海港检疫所
议员	森本政一	华南燐寸
议员	关伊势吉	

资料来源:广东日本商工会議所編「新広東」、250/1頁。“所属”参考以下资料有关内容:山本喜代人編「華南商工人名録」、華南商工人名録発行所、1943年。

① 广东日本商工会議所編「新広東」、广东日本商工会議所、1940年、250/1頁。

② 广东日本商工会議所編「新広東」、250/1頁。

③ 广东日本商工会議所編「新広東」、250/2頁。

由上表可知,改组为兵团后的首任参事会长为抗战前曾担任商工会议所副会头的元老冈本矶太郎,副会长为广东统制团体的代表者。此外日资银行业及贸易业主要代表,国策会社等也纷纷参与其中。虽然因对上述人员所属企业或团体的了解尚不全面而难以深入探讨,但从专门勾结日军特务部贩售鸦片的台籍企业福民堂名列其中^①,可知升格改组后的居留兵团大概网罗了日本居留民“各界”的重要代表。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4月居留兵团废除了参事会长制,改为居留兵团长制。居留兵团长较此前的参事会长拥有更大的权限,并在其下设置庶务、学务、社会、会计、税务等5课,各课负责人辅助居留兵团长来处理具体事务。参事会的性质则由执行机构变为咨询机构。于是改组后的居留兵团组织架构可分为3个部分,即:仍作为决议机构的兵团民会,作为执行机构的居留兵团长及其辅助部门,和作为咨询机构的参事会。此外,居留兵团还组织成立了一系列附属于居留兵团的常设委员会,如兵团税调查委员会、兵团税审查委员会等,并任命卫生委员、法规委员及学务委员各数名。^②

在此番机构调整的同时,居留兵团还将广州日本居留民的居住地域划分为13个区,在各区内分别设置町内会,并任命会长、副会长及其他干部,从事居留兵团事务的辅助和联络。作为居留兵团的下级机构,町内会的具体职责是辅助执行神社、教育、保健、卫生及保安事务、普及由官方或公共团体发布的通知、协助居留兵团课金的核定与征收、查核町内会会员的变动、调查人口以及负责其他必要事项。^③在各个町内会的内部又再组织起数个邻保班。邻保班的性质不同于在广州中国人社区结成的保甲^④,它作为承担町内会具体事务的细胞组织,遵照占领当局的统制经济政策而对日本居留民进行物资配给,并以各区为单位举办体育活动及其他各类庆典。^⑤此外,广州日本居留民的火葬场、墓地、国民学校、实业专修学校、高等女子学校等公共设施或教育机构也被置于居留兵团的管辖之下,并使用居留兵团的财政收入维持运营。^⑥

由于资料所限,在1942年改组之初居留兵团主要成员的情况尚不清楚。但可通过表5考察次年兵团民会议员的构成,进而探究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居留兵团核心成员的有关情况。

表5 广东日本居留兵团民会议员(1943年3月)

职务	姓名	所属	1940年在籍情况
议长	唐泽信夫	南支日报社	参事会员
副议长	平野健	商工会议所	
参事会员	池田佐一郎	华南银行	议员
参事会员	陈旺枏	福民堂	议员

① 据江口圭一考证,台湾籍民陈思斋(其与陈旺枏间的关系尚不明确)开设福民堂,并在广州近郊设立7家分店,从1939年5月起积极协助广州日军特务部进行鸦片专卖。在其后两年内,福民堂共付给日军特务部20万日元以购买鸦片专卖权,且每月对其上缴1000日元。此后由于广州地区走私盛行,民间购买力低下,福民堂的鸦片生意逐渐萎缩,终于在1942年6月合约期满时解约。(江口圭一『日中アヘン戦争』、岩波書店、1988年、113頁、157頁)

② 平野健編『廣東之現状』、77—78頁。

③ 廣東日本商工會議所編『新廣東』、250/2頁。

④ 汪伪政府成立后,模仿战前保甲体制在广州重建了保甲组织,其目的在于监视、控制民众,打击抗日活动与防谍。(沈成飞:《广州沦陷时期保甲制度的推行及其特色》,《广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4期,第113—114页)

⑤ 平野健編『廣東之現状』、78頁。

⑥ 平野健編『廣東之現状』、77頁。

续表 5

职务	姓名	所属	1940年在籍情况
参事会员	冈本矶太郎	协同组	参事会长
参事会员	南方熊太郎	大东京	
参事会员	山木孝平	自来水厂	
参事会员	喜多山松之助	广东鱼市场组合	参事会副会长
参事会员	岛义雄	海港检疫所	议员
会计检查委员	小野哲一	横滨正金银行	
会计检查委员	常見秀夫	电力厂	
会计检查委员	东光太郎	三井物产	议员
议员	井上宗五郎	井上洋行	
议员	滨田林藏	福大公司	
议员	叶山松荣	叶医院	
议员	折田重雄	折田洋行	
议员	大盐伸三郎	大盐新开堂	
议员	高田正男	高田商会	
议员	竹割政男	广东内河运营组合	议员
议员	永渊清	大国洋行	
议员	罗阿进	广福公司	议员
议员	小林利一	清风	
议员	渥美实藏	三菱商事	
议员	青木武雄	鎌野时计	
议员	岩见芳四郎	朝日洋行	
议员	江藤义男	回生医院	
议员	平山秀助	日本水产	
议员	广林文彦	冠世公司联发商行	
议员	森本政一	华南燐寸	议员
议员	铃木透	东亚海运	

资料来源：山本喜代人编「华南商工人名録」、8—9页。

据表 5 可知,民团国会议员的构成情况是非常复杂的。其中不仅包含正金银行和华南银行等银行业代表,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贸易业代表,东亚海运和福大公司等国策会社代表,广东鱼市场组合与内河营运组合等本地统制团体,还包括受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与台湾拓殖株式会社把持的广州电力厂和自来水厂,受日本掌控的海港检疫所等,其他如“清风”“福民堂”“回生医院”等餐饮、鸦片专卖和医疗界的代表也都名列其中。如果说广泛的议员背景可以赋予民团国会以足够的代表性和权威性,那么其正、副议长的所属则更能说明民团国会的性质。议长唐泽信夫同时以本名和“唐信夫”的笔名主持两份报纸,分别是《南支日报》和《广东迅报》,前者是沦陷时期广州唯一的日文报纸,后者则是代表日本占领当局立场的中文报刊,唐泽信夫虽名列居留民团,然而因掌管言

论喉舌而与日本占领当局联系密切。^①平野健则至少从1941年起长期作为商工会议所的理事。^②由此二人充任居留民团决议机构民团民会的正、副议长之职,正可以说明占领当局对居留民团具备重要影响力,以及居留民团对于日本居留民经济活动的重视。他们的背景不仅能够推动民团事务顺利开展,而且其意见也很可能对于民团民会乃至整个民团的决策走向产生重要的牵引作用。

此外,由于尚不明了表4中所有民团民会议员的所属企业或团体,所以仅能将其与表5做部分对照,“1940年在籍情况”一栏显示了表4中的议员名或其所属单位在1943年民团民会中再次出现的情况。据此能够确认的重要事实是,1940年的参事会正、副会长仍然在1943年充当参事会员,而1943年的民团民会议长唐泽信夫也曾是1940年参事会员之一。据此,则参事会员应属于民团民会中具有稳定性的群体,虽然民团经历了改选,但一批早期骨干的意志却能够对于民团的决策发生持久的影响力。

结 论

通过以上考察,本文认为与抗战爆发前相比,沦陷时期的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无论在人口波动或是职业分布方面都呈现出新的特征。其整体发展情况又可以太平洋战争爆发为界线分为前后两段。

在前段,日军对广州的占领导致日本居留民人口迅猛增长,活动地域扩展至广州市区,为其“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而这种繁荣在其职业分布层面,则表现为日本企业广泛分布在广州各经济领域内,并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命脉,而“特种营业店”的大量出现则说明广州与其他日本在华占领地一样,具有依附于日军的侧面。另一方面,日本居留民的主要团体“广东日本居留民会”得以重设,并升格为“广东日本居留民团”。为此,“繁荣”和“复苏”可以概括此时日本居留民群体的发展情况。

在后段,日本居留民群体规模逐渐萎缩。同时随着占领地统制经济政策的强化,日本居留民的择业自由受到了限制,逐步被集中到指定产业部门中。在此背景下,居留民团进行了改组,其决议机构民团民会领导层的改选结果体现出居留民团接受占领当局的领导,并重视日本居留民群体的经济问题。此外,通过设立町内会和邻保班等下级机构,居留民团将触角延伸至当地日本居留民基层,加强了对全体日本居留民的管理,并通过控制物资配给将日本居留民的日常生活置于占领当局统制经济政策的直接影响下。总之,人口规模不断萎缩和“统制化”色彩不断加深,成为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广州日本居留民群体的突出特征。

〔作者张传宇,暨南大学历史系讲师〕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山本喜代人编《华南商工人名录》,92页;王棠:《广州沦陷期间日伪报纸见闻录》,陈泽泓主编:《广州话旧——〈羊城今古〉精选(1987—2000)》,广州出版社2002年版,第1089—1090页。

^② 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昭和十六年度事业概要》、广东日本商工会议所,1942年,2—3页。